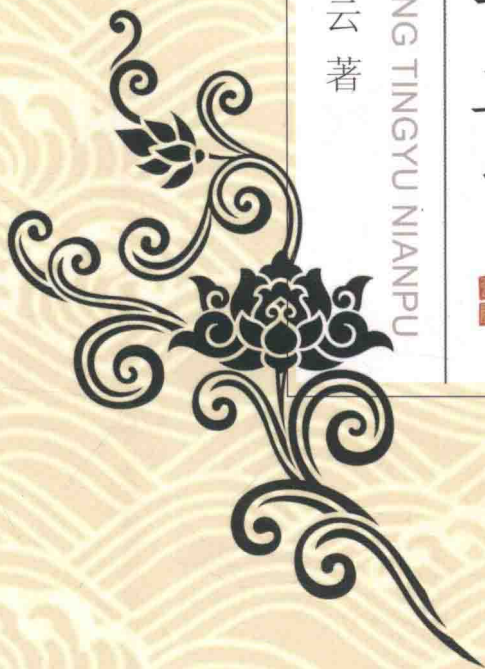


# 张廷玉 年谱




ZHANG TINGYU NIANPU

张体云 著



张廷玉（1672—1755年），字衡臣，号砚斋，安徽桐城人。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 张廷玉 年谱



ZHANG TINGYU NIANPU

张体云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张廷玉年谱/张体云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6.6

ISBN 978-7-212-08869-9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张廷玉(1672—1755年)—年谱 IV. ①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3606号

---

## 张廷玉年谱

张体云 著

---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印制:董 亮

责任编辑:蒋越林

装帧设计:宋文岚

---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63533258 0551-63533292(传真)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制: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

开本:710mm×1010mm 1/16 印张:31.5 字数:650千字

版次: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8869-9 定价: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序

蒋长栋

张体云女士的《张英年谱》与《张廷玉年谱》即将出版，嘱托我为之作序。初览两《谱》近百万字的书稿，我不禁为体云女士投入的巨大心血和取得的非凡成就而赞叹和骄傲。十几年前她在我门下攻读湘大古代文学硕士学位期间，就对考据情有独钟，与枯燥繁琐的史料打交道竟成为她最大的乐趣，还在《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过考据型文章。到合肥学院工作后，她在古代文学、文献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颇多收获，还去韩国做过外教，但其强项仍是考据，而研究重心则是其老家桐城那厚重的历史与文化。为桐城籍父子宰相所作的《张英年谱》与《张廷玉年谱》，则是她所主持的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的终期成果。令人欣慰的是，体云女士的考据成果已不再是当年的嫩苗小草，而是蔚为壮观的参天大树。

我将之称为参天大树，不仅因为两《谱》的规模之巨，而且还因为两《谱》的价值和意义非同寻常。仅从张氏父子作为清代康、雍、乾三朝的宰相来看，对他们的身世行踪进行考据，已超出对一般个体文人研究的意义，具有笼罩一个时代诸多方面的宏观研究意义。同时，即使就个体研究而言，他们在那一时代的政治学、经济学、文学、史学、档案学乃至军事学等诸多领域，都有着其独特的成就与创获。然而，对于这样两位影响几代朝政，有着诸多学术成就，地位显赫且带着某种传奇色彩的父子宰相，历来的研究却既不系统也不充分。即以生平研究而论，目前已出版的大型谱牒文献如《中国历代名人年谱》《北京图书馆珍本年谱》《乾嘉名儒年谱》《清初名人年谱》等，皆无张英年谱；而张廷玉的《澄怀主人自订年谱》，因“癸卯岁室庐不戒于火，遂为灰炉”，重修后的《自订年谱》则因“年既垂暮，机务日繁”而“亦多遗忘，不无挂漏”（张廷玉《自订年谱序》）。正因为这样，体云女士所著《张英年谱》与《张廷玉年谱》，便填补了学术上的一个巨大空白，不仅对张氏父子宰相的个体研究具有扎实的奠基意义，而且对清代前中期政治、经济、文学、历史、档案乃至军事等诸多领域的研究，都提供了可靠而重要的基础。

当选题正确后，决定考据型著作价值之有无与大小者，关键在能否遵循重证据、求真原则进行写作。通览两《谱》，我以为体云女士在坚持这一原则方面，足堪称为典范。这部《张廷玉年谱》在坚持这一原则上就尤为突出，重证求实既是该著最大的优点，又是该著最大的特点。

《张廷玉年谱》将张氏的生平事迹按时间顺序分为五卷，也即五个阶段，这是作年谱所共同遵循的结构框架，是科学而又合理的。若能保证每一年月日的事迹记载都准确无

误,则五个时期所记事迹的相互勾连,便可准确形成一部动态描述张氏一生行踪事迹的灵动年谱。在这里,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每日每事之细小环节——即年谱中最细小最基本单位的记载必须是准确无误,证据可靠的。为达此目的,体云女士的做法是,将张廷玉之《自订年谱》,同相关史料如《康熙实录》《圣祖实录》《康熙起居注》《乾隆起居注》等朝廷实录,其父张英及其他亲戚、友人、同僚的相关记载,乃至正史野史的记载等,相互参照比较,鉴真别伪,在统筹兼顾中酌定每一记载的真实与否。对相互矛盾而一时无法作出准确判断的记载,不妨暂阙如待定。应该说,这种“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做法,从根本上保证了整部年谱在考据上的客观真实,准确无误。

体云女士重证求实的学风,促成其《张廷玉年谱》在学术上有着贯穿全著的出彩亮点,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张廷玉事迹的时间勘误与辨证几乎贯穿于康熙、雍正与乾隆等各个时期,因而也便笼罩了整部《年谱》。而且,其细致程度已臻于对年份、月份乃至日期的考索,可谓无微不至。例如康熙二十二年、五十五年、五十六年、五十七年,雍正十一年,乾隆十年、十二年等年代中,张氏《自订年谱》中所载的大量或年份、或月份、或日期频频有误,《张廷玉年谱》皆据权威史料一一作出斧正,令人不能不信服。年谱的最基本功能就是准确厘清所记事实的时间线索,《张廷玉年谱》之成功与价值,首先也便体现在此。

二是对张廷玉《自订年谱》的材料补证贯穿于整部著作,使整部《年谱》较《自订年谱》内容更充实,记载更准确,叙事更具体。《张廷玉年谱》中所列的大量史料有时看似只是对《自订年谱》的某种印证,但是,由于《自订年谱》有“亦多遗忘,不无挂漏”的缺憾,因而《张廷玉年谱》所引相关史料便大多具有补缺充漏,使事迹记载更加清晰完整的作用。例如,雍正七年的《自订年谱》只有较为简单的记载:“十月,奉上谕:‘张廷玉协赞朕躬,忠诚宣猷,为国家办理政务勤慎奉职,甚属可嘉。著加少保。’”而《张廷玉年谱》所引《雍正实录》卷八十七之材料,则不仅将时间具体到“十月二十七日戊辰”,而且将“谕”的对象“内阁”,“谕”的全部内容完整呈现出来。这种引用除了起到对《自订年谱》的印证作用外,更弥补了《自订年谱》信息量的简略与不足,使所记事迹更加完整清晰,而这又为其他欲进行更深入研究者提供了更广阔的信息与背景。因而,这种贯穿于全书的看似最普通的材料引证,同样也成为该著的亮点。

谁都不能保证一部五十来万字的考据著作没有一点瑕疵,但即使如此,体云女士的《张廷玉年谱》仍堪称为一部张廷玉研究中较为完美而具有奠基意义的力作。但愿以此著之出版为契机,有关张廷玉诸多方面的系统研究,也能借之而跃上一个更新更高的台阶。

(作者系湘潭大学教授)

## 前言

康熙十一年九月九日重阳节这一天，张廷玉出生于京师。时其父张英刚刚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事业刚刚起步。第二年春，张英应掌院学士傅达礼和熊赐履的推荐，每日进讲，开始了他的近臣生涯。因在皇帝身边工作，所以张英的政治地位显得重要起来，但是清代官员的薪水都比较低，作为侍直内廷的翰林官，几乎没有外快可寻，故当时张英一家人的生活是相当清苦的。传说康熙十二年，张英任会试同考官时，有人上门送礼，被张英断然拒绝了，结果锁闱期间，张英一家人就是靠几斗面过了一个月。张廷玉正出生在这一时期，一直随父母在京师成长。张廷玉的哥哥张廷瓚出道很早，康熙十七年二十四岁时，参加顺天乡试，得举人第二十名。康熙十八年中式进士，名次是一百九名，但殿试成绩很好，二甲二名，算是名列前茅了。康熙皇帝对他印象很好，一直在康熙皇帝身边侍从。张英早期重点培养和发展的对象也是他，张廷瓚仕途发展相当顺利，每次康熙出行，他都随侍左右。康熙四十一年春，张英休致，携家眷回桐城，廷玉护送回籍，五月返回京师。张廷瓚一直留在京师，张廷瓚身体一直羸弱，父母离开京师，亲人照顾自然没有以前那么细致。秋天，张廷瓚在京抱恙，体力不支，父母在桐城很着急，张英多次手谕劝诫要安心调理。九月二十日，康熙皇帝出视河工，翰林官例要请从，时张廷瓚抱病在身，同人劝他不要扈从，但他硬是署名请求扈从，结果途中病发，康熙皇帝派人用轿子先把他送回京师。回京师之后，廷瓚就一病不起，于是年十月二十七日抱憾辞世，享年四十有八，时张廷玉在京师，一手操办了哥哥的丧事。

友人陈元龙《传恭堂诗集序》中描述当时情形：

“吾师（指张英）在内廷屡屡乞归，不得请，至辛巳冬，始荷予告请，以二世兄（指张廷玉）送归，而留先生（指张廷瓚）以自代，先生瞻恋庭闱既深，孺慕而又恋世受国恩，期尽瘁以仰报文章职业，虽多病体羸，不自宽假。壬午之秋，车驾将南发，凡在讲筵，例请扈行，时先生方抱病，同官劝先生勿署名，先生以主眷深重，力疾固请，勉策马以从。越三程而先生病甚，上命以肩舆送归，先生以不终事为隐疾，郁郁竟至不起，盖先生笃于至性而于忠孝大伦，真挚过人，虽抱负未竟而遗编尚在，读先生之诗，可想见先生之为人矣。”（《四库未收书》第七辑，二九，四九）

张英得到廷瓚去世的消息，不甚哀恸，亲自为其作《子廷瓚行略》。张廷瓚的离世，对

于张氏家族来说,使正在成长的气运戛然而止,这使张英悲恸不已,廷瓚的母亲姚夫人也因过于悲痛而落下了病根。张廷瓚如果不是英年早逝的话,张氏的下一个宰相很可能是他,张廷瓚的早逝,使张氏的福泽自然流向了次子张廷玉。

另外,父亲张英长期在皇帝身边,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风险,由于他长期在内廷侍直,专以学术启沃帝王,康熙皇帝也要求他不要偃合外事,所以他的心事倒也单纯,一心只读圣贤书,对于权和利非常淡泊。康熙三十六年张英做礼部尚书时,就屡屡上书,请辞归里,康熙觉得他为人诚实,德行好,说什么也不许。康熙皇帝与张英曾朝夕相处数十年,感情深厚,康熙皇帝对张英的学问人品充分信任,一直想委以重任,康熙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康熙当廷臣之面道出他对张英的由衷喜爱。

《康熙起居注》云:“九卿覆总河于成龙题,为修河开捐纳事,议准行。上曰:‘于成龙其人颇优,尚能勉效,凡委之以事,亦克有济,但偏于为人,朕亦从面谕,今欲开捐纳事例,亦仍有所为乎?如内庭供奉之张英、励杜讷、高士奇等,朕未常稍有偏注于彼,皆按俸资升迁。张英为人诚实,不事交往,尔等亦皆素知。朕欲授为大学士,犹恐众议以朕为有偏心用之’。”(《康熙起居注》第六册,一九一)

从这段文字来看,康熙早就想提拔张英为大学士,但没有合适的机会,后来把合肥大学士李天馥休致时的大学士员缺,让张英顶上。了了康熙皇帝一直存在心底的一个心结。从《康熙起居注》的记录来看,每天上朝都有五大常委出席,张英是其中之一。张英进入政府的权力核心层,但他并不留恋权位,他一心向往解甲归田。康熙四十年十月,经再三请辞,康熙终于同意了他的退休请求。他把两个儿子廷瓚和廷玉留在了朝廷,实希望他们将来能勉为国器。但不幸的是张廷瓚福薄,英年早逝,这份福泽就自然留给了张廷玉。

张廷玉于康熙三十九年在一场特别安排的考试中被录取,这里我要讲的是他的才学早年其实并不突出。当时成绩是殿试三甲第一百五十二名,成绩只能算是一般,他和所有二甲及其他三甲进士一起成了庶吉士,但他很勤奋,懂得康熙皇帝的用人之道,这应当与父亲张英和哥哥张廷瓚正确指点有关。入翰林学习以后,张廷玉日夜努力学习清书,每次考试清书都名列前茅。康熙四十二年,御试清书时,他得了一等第一名的好成绩,当时即被授翰林院检讨,清书成绩的突出,实现了他和皇帝之间的无障碍交流,成为他后来仕途发展的一个重要凭借。

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帝南巡,父亲张英迎驾于淮安府,因大哥廷瓚过世不久,当时张英仍在悲恸之中,气色不太好,康熙非常关心地劝慰他,并赏赐给他诸多御用袍帽等用品。笔者认为,张英迎驾淮安府,多少对张廷玉的仕途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康熙四十三年,张廷玉就被安排入直南书房,进入内廷。是年冬,以翰林院检讨充日讲起居注官。之后,张廷玉长期在翰林院任职,几乎每年都要扈从康熙出塞、打猎,其中甘苦,他自己知道。埋头工作,兢兢业业,熬到了康熙五十四年,康熙皇帝主动提出要提拔张廷玉,提拔的理由,一方面是其本身工作敬业,另一方面也是其优待老臣心情的一种表达。他说“张廷玉学问素优,在内廷供奉年久,宜加迁擢,以示奖励,旋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张

廷玉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从二品，康熙五十九年五月，升刑部左侍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驾崩，此时张廷玉在朝已二十多年，对政务非常熟悉，年届五十，正是经验丰富，精力充沛，蓄势待发之时。

雍正皇帝此时登基，张廷玉就历史性地和雍正皇帝一起并肩作战，共同成长，并建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

就雍正皇帝而言，继位之初，正是急需用人之际，重用汉人张廷玉，这里面的奥妙不少专家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方面：

第一，是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有研究者认为，雍正皇帝初登皇位，立足未稳，加上舆论上的不利地位，雍正皇帝为了迅速扭转自己的弱君状态，巩固自己的帝位，一方面优宠有影响的满洲贵族，但满洲贵族势力太大，会导致皇权受到相当程度的干扰，这使得雍正皇帝考虑到专宠满洲贵族对皇权的发挥并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为了避免满洲贵族权力过大干扰皇权的弊端，雍正皇帝决定在汉人中扶植可用的亲信，因为汉大臣在当时不是统治民族，处于先天弱势地位，不会对皇权起到多大的干扰作用，因此对于雍正来说，汉人可用而又方便驾驭。同时，也可以达到以汉治汉的目的，这是雍正皇帝重用张廷玉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

第二，是张英与世宗宪皇帝之间的师生情。张英在朝三十年，不结党营私，不拉帮结派，学问优长，“日侍左右，恪恭匪懈，勤慎有嘉”（《汉名臣传张英列传》卷七《清代人物传记丛刊》三八，八一六至八二九），“民生吏治，悉心献纳，外和内刚，一私不染”（《重修安徽通志》卷一七七《人物志名宦》一六），在康熙朝留下光辉的历史形象。雍正皇帝年少时，诸皇子在南书房都受到过张英的教导，雍正对张英老师的印象相当好，当年张英休致南归时，时为皇四子的雍正皇帝专门写诗二首以宠其行。其诗张氏家族一直保存，雍正皇帝登基后，张廷玉特地将此诗献给雍正皇帝，激起了世宗宪皇帝的甘盘旧学之思，做了一系列表示：赠太子太傅，崇祀京城贤良祠，赐祭于本籍，并御书匾联“忠纯贻范”、“师模如在”以赐。（《颜氏家藏尺牍·姓氏考》，《清代人物传记丛刊》二九，八二〇至八二一）纯真的师生之情以及张英的良好表现，是张廷玉被信任和重用的又一重要基础。

第三，与张廷玉本人的学识和教养有关。张廷玉立朝二十多年，长期在圣祖身边工作，对皇族事务非常熟悉，至雍正元年时，正是其经验丰富、精力充沛之时，也正是他为国效力的最佳时期，再加上他长于文辞，善于谋划，办事勤勉，恪守其父生前所教为官为人之道，雍正皇帝在藩邸时对张廷玉就印象很好，他说：“朕在藩邸时，不欲与廷臣相接，是以未识汝面。曩者奉皇考命，会同大学士办理公事，汝以学士趋跽其间，朕见汝气度端凝，应对明晰，心甚器重之，询之旁人，知为吾张师傅之子，朕心喜曰：‘吾师有子矣。’后闻汝官刑部、吏部，皆有令名，更为喜慰。今见汝居心忠赤，办事敬诚，益知为天祚所笃生，皇考所教养，成兹伟器，以辅翊朕躬也。汝其勉之。”（《澄怀主人自订年谱》卷一，一九）可见，当年，雍正皇帝就感觉到张廷玉的气度不凡，心喜之。两人合作以后，雍正皇帝发现，张廷玉每次在缮写谕旨时，都能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皇上的心意，正如雍正皇帝所言，“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这使雍正皇帝觉得他办事得力又贴心，对他很满意。渐渐地张廷玉就成了雍正皇帝有效执政不可缺少的左右臂。



读完《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实录》和张廷玉的《自订年谱》，让人深刻感受到雍正皇帝对张廷玉的知遇之恩，他们之间有充分的信任和同情在雍正帝时期，张廷玉仕途腾达，极尽辉煌，经济财力上都得到史无前例的优待。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雍正皇帝继位一个月后，张廷玉升礼部尚书，正二品，并担任《圣祖仁皇帝实录》副总裁官。雍正三年七月，开始署理大学士事务。雍正四年二月，实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管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事；三月，充《仁皇帝实录》总裁官。雍正五年十月十六日，授文华殿大学士。雍正六年三月十三日，授保和殿大学士。雍正七年十月，因“协赞朕躬，忠诚宣猷，为国家办理政务，勤慎奉职，甚属可嘉，著加少保”。雍正八年，平乱之后，与其他主事者马尔赛、蒋廷锡一起，以“赞襄机务，公正无私，慎重周详，事事妥协，一片至诚之悃，方之史册所载，一心一德之风，洵属无愧”，赏给“一等阿达哈哈番，永远承袭。仍各加二级。其所赐世职，伊等或带于本身，或给与伊子，听其自便。”（《澄怀主人自订年谱》卷二）张廷玉推辞，雍正皇帝说：“汝之勋在疆场汗马之上，朕意以定，不必固辞。”（《澄怀主人自订年谱》卷二）

雍正皇帝对张廷玉恩宠有加，不仅工作上信任他，而且在钱财上对张廷玉出手也很大方，赏赐多多。

雍正元年五月，张廷玉“室庐不戒于火”，雍正皇帝遣官慰问，赐官房一所，并白金一千两。雍正三年，又赐居圆明园之东威畹旧园，张廷玉以当年康熙御赐的“澄怀”二字命名所居为“澄怀园”。雍正八年四月，雍正皇帝赏银二万两，张廷玉固辞，雍正皇帝言：“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当体朕心，不必再辞”。是年八月，京师地震，雍正皇帝又赐“白金一万两，为修葺屋宇之用”。雍正十一年赏银一万两并给假三个月安排张廷玉回籍办理祭祀大典。据张廷玉自己说，像这种慷慨的赏赐前后有六次之多。前后对比一下，康熙二十年，他的父亲张英请假回籍祭葬父亲张秉彝时，康熙只赏赐了五百两银子。乾隆十一年张若霁意外病逝，乾隆皇帝赏银不过一千两赐祭，前后对比，可以看出，雍正皇帝对张廷玉的恩情有多深重。

雍正皇帝有心重用，张廷玉也知恩投报，不负君望，在特殊的历史时刻，为雍正皇帝提供了最贴心的政治服务，为雍正皇帝政权的稳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有学者猜测，雍正皇帝上台充满玄机，张廷玉主持纂修《清圣祖实录》，销毁了大量对雍正皇帝不利的材料，对雍正多有溢美之词，为雍正皇帝坐稳江山制造了舆论支持，这种人心的支持，让压力重重的雍正皇帝深为感激。“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钜。……将来著配享太庙，以昭恩礼。”（《澄怀主人自订年谱》卷三，五四；另见《清高宗实录》卷一，雍正十三年八月庚寅条）《清圣祖实录》的完成，对雍正皇帝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这一段历史的记录和塑造，对于雍正皇帝来说，完成了历史的舆论支持，非常重要。从后来的反应来看，雍正皇帝对张廷玉的纂修工作非常满意，他认定这是张廷玉对雍正王朝的一个重大功劳，直到晚年，他还一直记着这一份恩情。按道理来说，一部史书的编纂，皇帝犯不着如此用心，这其中必有关乎皇帝自身的重要情节，后人只有猜测，其中奥妙，只有雍正皇帝和张廷玉本人心知肚明了。

后来,张廷玉帮助雍正皇帝完成《大义觉迷录》,进一步在全国统一思想,向全国宣告雍正皇帝的合法地位。

雍正八年(1730年),长期和清廷对抗的蒙古准噶尔部煽动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及西北各族反清,雍正帝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决定出兵征讨。因战事紧急,军令需迅速处理和严守秘密。所以,即令在隆宗门内设立“军机房”,嗣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命怡亲王允祥、张廷玉及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廷玉定規制”。按照旨意,张廷玉就军机处的性质、官职、职能、纪律等方面都作出了严格规定,其中涉及档案的地方就达多处,如“军机处参予官员奏折的处理和谕旨的撰拟;军机章京负责誊写、记档及日常工作;军机处设《存记簿》”,“奉旨从议事务,一律登记”,“密事有件”,密封存档,届时折阅办理等,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李喜林,《雍正朝的大臣与档案》,《兰台世界》一九九九,五)

张廷玉在各种新制度的创建,新规范的建立方面,立下汗马功劳,辅助雍正皇帝做好了文治大业,他主持军机处的创建和制度的规范等工作,为完善国家管理,为皇权的进一步集中,为清代国家机构建设和制度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正因为此,雍正皇帝,对张廷玉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给了他至高无上的荣誉,让其配享太庙。显然,雍正皇帝是深刻明白张廷玉的历史贡献的。徐凯先生认为:张廷玉“对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强化及清初政治的巩固,起到了一种极为特殊的作用。”[徐凯:《论雍乾枢要之臣张廷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二(四):九一]

张廷玉对雍正王朝所做的最后一个重大贡献,是完成了雍正皇帝的心愿,扶持乾隆皇帝登基并稳住根基。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世宗宪皇帝病危,召见重要人员,宣布鄂尔泰和张廷玉为辅政大臣。《乾隆实录》云:“戊子。上不豫,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皇五子和亲王弘昼朝夕侍侧。戌刻,上疾大渐。召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公丰盛额、讷亲、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至寝宫前。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恭捧上御笔亲书密旨,命皇四子宝亲王弘历为皇太子,即皇帝位。少顷,皇太子传上旨:‘著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乾隆实录》卷一)

乾隆刚刚上台,在张廷玉等人帮助下,乾隆皇帝顺利地完成了权力交接,开始乾隆是非常感念张廷玉等人的功劳的,对其赏赐有加。乾隆皇帝登基第二天,就重申了鄂尔泰和张廷玉配享太庙一事。当时鄂尔泰和张廷玉都“屡行固辞”,乾隆“复再三降谕”,然后将雍正皇帝准其配享太庙的遗旨,“入于遗诏内颁发”天下。不仅如此,九月十三日,乾隆皇帝很慷慨地赏给鄂尔泰和张廷玉世袭一等轻车都尉。《乾隆实录》云:“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在皇考时,宣力多年。朕即位以来,总理事务,敬慎周详,夙夜匪懈。今皇考梓宫已安奉雍和宫,办理诸事,俱属妥协,应加恩以示酬庸之典。庄亲王、果亲王俱著永远赐与亲王双俸。鄂尔泰、张廷玉俱著赏给世袭一等轻车都尉。朱轼著赏给世袭骑都尉。该部即遵谕行。”(《乾隆实录》卷二)不仅如此,这个月张廷玉还获得如下赏赐:

《自订年谱》云:“九月,遇覃恩诰授光禄大夫,总理事务,经筵日讲官、起居注、少

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兼管吏部、户部尚书事，仍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妻姚氏诰赠一品夫人，曾祖父、祖父俱诰赠光禄大夫，曾祖母、祖母俱赠一品太夫人。父诰赠光禄大夫，太傅兼太子傅，经筵讲官，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加二级，母赠一品太夫人，第三子若淑荫一品监生，又奉特恩给邓世袭一等轻车都尉，部议以二轻车都尉应并一，三等子仍令长子张若霭承袭，奉旨俞允。十月二日，让张若霭承袭‘三等子’衔。”

从这段文字来看，除了张廷玉本人如日中天之外，同时张氏一门都跟着受封赏，荣耀无限。

嘉奖的同时，新皇帝也开始了自己树立权威、巩固皇权的过程，他开始对朝廷上下官员开展整风运动，上到辅政大臣，下到身边的太监，事无巨细，都在治理之列，这自然会让张廷玉有今非昔比之感。

九月十七日，乾隆皇帝开始对老臣们出言不恭，对张廷玉的打击，由此开始。

谕云：“凡办理天下之事，惟有物来顺应，不可预存是非可否之见于胸中。不但海望所言，即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为朕所深加任用者，亦不可以其所言，尽以为是。盖识见不到，思虑未周之处，人所常有也。不宁惟是，即朕之谕旨，倘有错误之处，亦当据实直陈，不可随声附和。如此，则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尽去瞻顾之陋习，而庶政之不就理者鲜矣。诸王大臣等，日在左右，尚不知朕心，未免观望之意，则在外臣工之未曾接对者，又当何如乎？此事若非朕看出，岂不至于错误？向后当以为戒，并将虚公持平之道，晓谕内外臣工共勉之。”（《乾隆实录》卷三）

这时候的乾隆皇帝，一付整顿朝风的口气，既要去朝臣上下独断作风，谁都不能说了算，又要去其瞻顾陋习，谁都不能有敷衍之心，并特别强调即使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这样的威望老臣也不例外。他是要将所有人的权力关进笼子里去，估计四大辅臣当时听到小皇帝这番话，心里都很凉，张廷玉与乾隆皇帝之间的距离自然也因此拉开。

此后，张廷玉的职权开始逐步受到削减和制约，十月十八日，由邵基接替其兼管的翰林院事务。乾隆六年十二月四日，左都御史刘统勋当廷陈奏宜抑制桐城张家在朝廷的势力，并统计其近亲在册者，三年之内不得升转，这是对整个张氏家族仕途影响很大的一件事。

《乾隆实录》云：“都察院左都御史刘统勋奏：‘伏见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小心敬慎，皇上眷注优隆，久而弗替，可谓遭逢极盛，然大名之下，责备恒多，勋业之成。晚节当慎。外间舆论，动云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此盈满之候，而倾覆之机所易伏也。窃闻圣祖仁皇帝时，曾因廷臣有升转太速之员，特谕停止升转。原任大学士王熙之孙王景曾适在其内。臣愚以为宜仿此意，敕下大学士张廷玉，会同吏部衙门，将

张姚两姓部册有名者,详悉查明。其同姓不宗,与远房亲谊,不在此例。若系亲房近支,累世密戚,现任之员,开列奏闻,自命下之日为始。三年之内,停其升转,使望风逃听之人,知朝廷登进之无私,亦思世受国恩之家,长享福祿于无尽。’又奏:‘尚书公讷亲,未及强仕之年,统理吏户两部,入典宿卫。参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趋承禁闕,此外特交事件,尚有多端,即智力有余,亦苦分身乏术。如或精神劳惫,必至贻误,现今讷亲所管事务,何者可以量行省减,非臣愚所敢妄议但俾其才猷识力,常余于所办之事,则旷废之虞可免。又讷亲以一人之身,兼理数处,且时蒙召对,向用方隆,无论所隶属人员,奔走恐后,即同官寮审,亦皆敛手。虽未必至于开贿赂之门,窃威福之柄,然正谓事涉于因公,迹涉于任怨,或反覆驳诘,或寓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以臣所闻,议之者曰:部中议覆事件,历来所奉谕旨,与题定成例。有皆可引用者,司官多两引以待其主持。’又云:‘督抚题请事件,本属从宽,则吏户两部或改归从严。若督抚从严,部内必无改宽之事。皇上用人行政,无非出于至公,讷亲之居心行事,当亦极图报称。至其职任之繁简,气象之谦盈,尚望圣明裁度训示’”。两疏入,谕曰:“左都御史刘统勋奏:‘大学士张廷玉亲族居官人多,应请裁抑’一折。又奏:‘尚书讷亲,承办事务太多,并任事过锐’一折。朕思二臣若果声势赫奕,擅作威福,则刘统勋必不敢如此陈奏,今既有此奏,则二臣并无声势可以箝制僚审可知。此国家之祥瑞也,朕心转以为喜。且大臣办公,责任綦重,原不能免人之指摘,即伊等办事,亦岂能竟无差错,闻过而喜,古人所尚。朕君临天下,兢兢业业,如有能指陈阙失者,未尝不嘉纳之。大臣为众所观瞻,见人直陈已过,惟当深加警惕,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若有几微芥蒂于胸臆间,则非大臣之度矣。大学士张廷玉亲族人众,因而登仕藉者亦多,此固家运使然。然其亲族子弟等,或有矜肆之念,为上司者,或有瞻顾之情,则非大学士所能料及也。今一经查议,人人皆知谨飭检点,转于大学士张廷玉有益。刘统勋所请裁抑之处,著该部查议具奏。至讷亲身为尚书,若于本部之事,稍涉推诿,不肯担当,则模稜成习,公事何由办理?但所办之事,其中未协之处亦所不免,况朕时加教诲,戒其自满自足,年来已知恪遵朕训矣。今见此奏,益当留心自勉,至于职掌太多,如有可减之处,候朕酌量降旨。近来参奏大臣者,每多过当,殊不知旁观责人则易,而亲身任事则难。今之指摘大臣者,若任用至此地位,正恐未必能及也。朕之为君,固不逮尧舜,诸臣亦远逊皋夔稷契。若责诸臣以不如皋夔稷契,诸臣其奚辞?然朕自揣不能为尧舜,又安可徒责诸臣乎?”(《乾隆实录》卷一五六)

刘统勋的奏言,针对张廷玉和讷亲,似乎非常公正。笔者认为,刘统勋敢于弹劾张廷玉和讷亲这两位权倾人物,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刘统勋此举应当是事先征得乾隆皇帝的认同和授意。乾隆皇帝虽然在大廷之上替张廷玉做了圆场,但其表面上的抚慰与深层拍打警告,聪明的张廷玉应该是领会于心的。这一事件,使张廷玉所面临的政治危机表面化,成为张氏家族政治命运发展的历史转折点。张氏家族从此走向衰落。

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乾隆皇帝以“我朝文臣,无封公侯伯之例”,收回成命,取消了原定长子张若霭三等伯的承袭权,这是对张若霭仕途发展的一种抑制。张廷玉在《澄怀

主人自订年谱》中把当时的谕旨给记录下来。原文云：“奉上谕：‘我朝文臣，无封公侯伯之例，大学士张廷玉伯爵系格外加恩。彼时，伊奏请给与伊子张若霭，承袭之处不合。今著带于本身，伊子张若霭不必承袭。钦此’。”（另见《乾隆实录》卷一〇八）

乾隆九年三月，三弟张廷璐辞归。乾隆十一年三月，六弟张廷瑑以病辞归。乾隆十二年开，张廷玉本人也力辞政务，要求予告。这一连串的动作，分明是张氏家族对刘统勋弹劾之举的一个自觉回应，同时也给乾隆皇帝一个说明。

就在张廷瑑辞归之年，张若霭在随驾谒五台山的途中感寒热之症，一病不起，于是年十一月七日，溘然长逝。若霭意外去世，使张廷玉失去了他引以为豪的、精心培养多年的爱子，他身体顿衰，走路都显艰难。悲恸之中，为作《冢子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若霭行略》，历述若霭生平，字里行间，流露出文和公对其长子的疼爱之情。

十二月十六日，乾隆皇帝为表达对张廷玉的歉疚和安慰，特别关照，让其次子张若澄入南书房行走。之后，张若澄代替张若霭侍从乾隆皇帝左右，随驾出口，作画、写诗。

刘统勋的弹劾，乾隆皇帝的戒备之心，让张廷玉心寒意冷，归去之心一日坚比一日。乾隆十二年三月初一日，京察届期，廷玉遵例自陈，举刘于义自代大学士，汪由敦自代翰林院掌院学士，恳辞不允。乾隆十三年正月，张廷玉再次极力恳辞，不允。二十九日，“上以几暇召对，廷玉沥陈年力衰迈，实难供职，恳求解退，以免陨越，蒙恩慰留”。他的父亲张英文华殿大学士六十五岁就退休了，而张廷玉已经七十六岁了，却退休不成。在朝廷奋斗了近五十年，几乎是为国劳碌了一辈子，德高望重，没想小皇帝上台之后，态度强硬，对大臣们又拍又打又摸，似冷还热，似热还冷，这让年老的张廷玉多少有点吃不消，他越来越觉得待在朝廷里不自在，所以特别向往解甲归田，优游林下，去享受一下自己的晚年生活。但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省心。乾隆皇帝认为他作为配享太庙的大臣，自当以国为家，在朝廷效力直到老死才对，为了表示他对张廷玉的尊重和重视，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辞归。而张廷玉则坚持要退，他认为他都年近八十了，申请退休于情于理都是说得过去的。乾隆皇帝则刻意挽留，不许退，张廷玉则据理力争，坚决要退，君臣之间你来我往的坚持，彼此之间越发生分起来，两个人心里都很不快。乾隆皇帝觉得张氏家族，自康熙朝以来，世受国恩，在大清王朝已无如伦比，临了张廷玉对大清竟没有丝毫的眷恋之情，致使他对张廷玉的忠心产生怀疑，觉得他一心一意只在图谋个人利益，见好就收。乾隆皇帝对张廷玉的不满进一步加深，为他日后一念之间收回成命，废除所有之前的赏赐埋下了伏笔。

乾隆十二年六月，清兵征剿金川战役开始，直到乾隆十三年十月，金川战事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乾隆皇帝拿掉了前指挥讷亲和张广泗，派大学士傅恒负责经略金川军务，乾隆十四年正月，金川战事仍然在胶着状态。正月初三日，皇帝有心奖赏远在前沿阵地的傅恒等人，以鼓舞士气。乾隆皇帝这时候只对征战沙场的将领们感兴趣，对张廷玉等元老就很不客气，他说：“经略大学士此番出力，实为国家生色，朝廷锡命褒庸，祇论其人之能称与否，岂必犁庭执馘，方足称功？即如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亦因其勤慎翊赞，封爵酬庸，何尝有汗马劳耶？”（《乾隆起居注》第七册，三三三下）

这里很明显地表达了他对张廷玉和鄂尔泰功绩的质疑。他认为张廷玉在国家武功方面，未有汗马功劳，完全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只顾眼前，不论过去事实如何了。而且此时张

廷玉已年近八旬,身体和精神都不足以担当像金川战役这样的重大任务了。客观地说,张廷玉在清朝历史上的作用,在雍正朝和乾隆初年已发挥殆尽,乾隆皇帝羽翼丰满以后,张廷玉也到了退居二线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发挥自己的能量了。在张廷玉看来,与其在朝廷混饭吃,不能为国家发挥作用,不如退居山林,自得其乐了。

乾隆皇帝和张廷玉之间的缘分显然是远不及其父雍正皇帝和张廷玉之间的缘分。尤其是乾隆十二年到乾隆十四年,金川战事激烈,更是让乾隆皇帝认识到武功的重要性,那些征战沙场的武将得到他特别的器重。从金川战场班师回朝的傅恒就是这一时期被钟爱的典型。乾隆十四年三月十日,乾隆下旨大学士傅恒照张廷玉例工作。

又谕:“大学士公傅恒,今既回朝,自应仍兼管吏户两部事务。但大学士承办公事繁多,动劳过甚,精力亦宜节养,著照大学士伯张廷玉从前办理部务之例,祇画题稿,所有咨行案件,各该堂官皆可办理,不必阅看。”(《乾隆实录》卷三三六;《乾隆起居注》第八册,八七下)

三月十一日起,大学士傅恒名列大学士张廷玉之前,兼管理藩院事务。(《乾隆起居注》第八册,八七下)

傅恒的战功,让长期守内的张廷玉黯然失色,激起了乾隆皇帝对张廷玉政绩的不满,他认为张廷玉从来就没有战功,根本就谈不上有功,只是舞文弄墨,小心供职,没有过错罢了。

乾隆十三年十月以来,张廷玉等人在工作中屡现过失被罚。首先是十月二十日,张廷玉因过失罚俸一年。

谕:“朕阅翰林院撰拟孝贤皇后冬至祭文内有泉台字面。此二字,用之常人尚可,即王公等宜不用,岂可加之皇后之尊?乃汉文既已误用,翻译亦不校正,大学士张廷玉等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谨之义。张廷玉、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俱著罚本俸一年。”(《乾隆起居注》第七册,三四六上;《乾隆实录》卷三二七)

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内阁所拟票签有误,张廷玉等被交部察议,并降二级处理。又因拟旨不合圣意,乾隆以其有分别满汉、分歧人心之嫌,给予苛责。十二月十一日,吏部议奏:“大学士张廷玉等票拟错误,请将大学士陈世倌、史贻直均革职。大学士三等伯张廷玉、大学士来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陈大受均降二级留任。张廷玉有加十五级,应销去二级,免其降级。”

乾隆十三年、十四年更是张廷玉不祥之年,霉事一桩接着一桩,小皇帝对他一点不徇私情,时时给他难看,甚至拿他说法。乾隆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在训斥尚书王安国时,将张廷玉等朝臣一并训斥,以为不论何人,应秉公执法,不得徇私。

谕:“前日召见尚书王安国,伊面陈目下正届科试,各省学臣,尚有未除积弊,朕以

事关学政，令其缮折具奏，候朕降旨。今伊奏称上科乡试之后……王安国身为大臣，奉旨询问。而所举皆参革病故之员，于学臣之现任者，悉诿为无从指实，不知人臣事君大义，凡所陈奏，宜本公忠，既不可有市恩之心，亦不可存避怨之见。王安国市恩之心纵无，避怨之见不免。朕自临御以来，何事不由乾断？廷臣中，又谁能庇护私人，倾排异己者？而必畏首畏尾，瞻徇退缩，乃至于是耶？且市恩朝臣之处，最有关系。夫所谓朝臣者，自有分别，现在如大学士张廷玉、史贻直、内廷办事尚书陈大受、梁诗正、汪由敦等或足以当之。若此数人者，果有恃势夤缘，各学臣果有徇情取录，王安国自应秉公指参，如不确凿举出，岂朝臣之子弟，皆不应循例与试，而该学臣以朝臣之故，转可故意裁抑，令不得与众人齿耶？总之，办理政务，宜辨公私，如事属管私，在朝臣尤当执法议处，若本无他故，亦不可因朝臣而有心苛求。朕用人行政，悉出于大中至正，丝毫不存成见，亦丝毫无所假借。第王安国既有此奏，各御史宁无风闻？何以无一人奏及？著传旨申飭，伊等如有所见，不妨据实直陈。但不可又如王安国以僮侗浮泛之词塞责，并谕各督抚，一体留心稽察。如学臣实有弊端，即宜纠劾，毋得徇隐”。（《乾隆实录》卷三四二；《乾隆起居注》第八册，一八八）

不管怎样，老了就是老了，乾隆皇帝再狠，也不能不顾这个事实，终于还是愿意慢慢地卸去张廷玉身上的繁重职务。乾隆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免其兼修五朝国史馆总裁之任，让爱将傅恒和刘统勋接手总裁工作。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又下旨减轻他的工作量，命其五日一朝。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对于张廷玉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乾隆皇帝终于答应让他休致了。

尽管近几年来，乾隆皇帝对张廷玉不满之处甚多，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强忍不满，努力让老臣张廷玉一生圆满收场，准其予告之日，特赐诗三首，以宠其行，并命内廷翰林和韵。

乾隆《御制诗二集》云：“大学士勤宣伯张廷玉，屡以年老乞休，慰留未允，近见其齿跻大耋，精力视前较减，优旨予告，俟开春冰泮登舟，赐诗三章以示眷注”。其一诗云：“早怀高义慕悬车，异数优留为弼予。近觉筇鸠艰步履，得教琴鹤返林间。银毫无奈吟轻别，赤芾还看赋遂初。（下注云：准以原官致仕，伯爵仍带于本身）拟问兰陵三疏傅，可曾廿四考中书。”其二诗云：“两朝纶阁谨无过，况复芸窗藉琢磨。此日兰舟归意定，一时翰苑怅思多。善恕不奉陪闲画，稳趁帆风送去波。南国诗人应面晤。（自注云：谓沈德潜）为谒食履近如何？”其三诗云：“坐论朝夕久勤宣，间别何能独忍然。同事当年今几在？（自注云：御极初所同事大臣如鄂尔泰、朱轼、徐本、徐元梦等物故者指不胜屈，今大学士张廷玉又以老告归矣）得舆硕果又言旋。江湖乡乐真饶后，廊庙吾忧岂忘先。指日翠华归幸处，欢颜前席问农田。”（《御制诗二集》卷一三，一一）

但在这三首诗中，乾隆皇帝对张廷玉一生政绩的总结“两朝纶阁谨无过”，从其“银毫无奈吟轻别”（其一）、“得舆硕果又言旋”、“廊庙吾忧岂忘先？”等诗句中明显流露出对张廷玉的不满情绪。

成功休致，张廷玉总算讨得个平安结局。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得旨休致之后，有廷臣议论其配享事宜，大约是张廷玉听到了不好的风声，所以在该年十二月九日这一天，

忍不住去面见乾隆皇帝，造膝陈情，乞皇帝一语为券。这让乾隆皇帝很不高兴，但他没有发作，同意了张廷玉之请，以诗为证，承诺配享不变。乾隆赐诗原题云：“大学士勤宣伯张廷玉先奉皇考遗诏将来配饷庙廷，今经予告，恳欵陈情，亟虑浮议，将弗克邀殊眷，朕即明颁诏旨，并成是诗，书以赐之，以为左券也”。诗云：“造膝陈情乞一辞，动予矜悯动予悲。先皇遗诏惟钦此，去国馀思或过之。可例青田原侑庙，漫愁卷国竟推碑。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御制诗二集》卷一三，一三）乾隆赐诗以后，还当廷陈说了这件事。

按道理来说，这事也算是圆满结束了，哪知，又出意外，张廷玉得旨之后，不知何故，竟没有及时面见谢恩。据张若澄《文和公行述》记载：当晚张廷玉回家起草奏折，“数易其稿，辗转至于鸡鸣，府君具冠服将入朝，忽觉头目眩晕，艰于步履，又恐奏折迟误，遂命不孝若澄代奏，逾时，眩晕稍定，而日已过午矣”。据张若澄记载来看，张廷玉当天晚上，身体确实出了状况，第二天行走不便，才让张若澄代奏。但心里因未能亲自谢恩而不安，因于次日一早（当是，十二月十一日），但《乾隆实录》上载其于十三日早晨进殿谢恩。当日，乾隆告诉大学士傅恒、史贻直：“朕许大学士张廷玉原官致仕，且允配享太庙之请，乃张廷玉具折谢恩，词称泥首阙廷，并不亲至。第令伊子张若澄代奏，因命军机大臣等传写谕旨，令其明白回奏”。又说：“朕前旨原谓配享大臣，不当归田终老，今朕怜其老而赐之归，是乃特恩也，既赐归而又曲从伊请，许其配享，是特恩外之特恩也，乃在朕则有请必从，而彼则恬不知感，则朕又何为屡加此格外之恩也？且又何以示在朝之群臣也乎？问愿归老乎？愿承受配享恩典乎？令其明白回奏。”乾隆皇帝要求张廷玉给个解释。张廷玉回折解释：“十三日实因心恐，谢恩稽迟，急欲趋阙泥首，是以向早入朝，并未先得信息等语。”但乾隆皇帝还是认为当时在内廷值班的汪由敦给张廷玉通风报信了，遂于十三日一早急急赶来谢恩。对于此事，乾隆皇帝的细致分析，似乎也有几分道理。

谕云：“张廷玉明白回奏折内称：‘十三日实因心恐，谢恩稽迟，急欲趋阙泥首，是以向早入朝，并未先得信息等语。’张廷玉之早来，必因先得信息。伊向来谢恩，不一而足，并未早来。何以是日来之独早？若谓并未得信，而次日早来，即可掩先日不来之过。此所见与儿童何异？岂久经事理之老大臣而宜出此？如果因风寒强劲，步履不前，则次日何常不寒？且何难于谢恩折内声明？或张若澄递折时，向奏事人口奏，乃并不及此。其回奏折内，于先得信息之处，亦不承认。是日承旨系傅恒、汪由敦二人，以二人并论，则非汪由敦而谁？即万有一分非汪由敦送信，亦必司员、中书等人送信。张廷玉在军机处年久，伊等皆其属员，此尚情理所有之事。若降旨革职严讯，未有不水落石出者。但朕自即位以来，即假借包容张廷玉至此矣。何值因此遽兴大狱？然若迫于不得不办，则朕非可蒙混了事者，且张廷玉折内，于汪由敦不涉一字，明系避重就轻。朕加恩于张廷玉，至深至厚，即近日之恩谕稠叠，本欲保全终始，宁于将去之时，而显暴其罪，不为包容？实有不得不然者。盖张廷玉与史贻直素不相合，史贻直久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在史贻直本不应如此陈奏，而彼时朕即不听其言也。张廷玉奏请面见时，称外人亦有议其将来不得配享者。朕问为谁，即



明指史贻直而言，及问以大学士员缺，即奏称汪由敦现在暂署，将来即可办理。其意在朝既与史贻直夙有嫌隙，今经休致，则史贻直独在阁中，恐于伊未便，故援引一素日相好之门生，则身虽去而与在朝无异，此等伎俩，可施之朕前乎？试思大学士何官，而可徇私援引乎？更思朕何如主，而容大臣等植党树私乎？史贻直即与张廷玉不协，又何能在朕前加之倾陷？若因张廷玉既去，即自矜得意，是亦自取罪戾耳。今日特令伊同军机大臣面见，朕明切训诲，或即伊将来可以承受恩典之地也。大臣等分门别户，衣钵相传，此岂盛世所有之事？我大清朝乾纲坐揽，朕临御至今十有四年，事无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独断？即月选一县令，未有不详加甄别者。宁有大学士一官，而不慎重详审，听其援置私人乎？其荐汪由敦，非以爱之而实害之也。是以昨旨中将汪由敦革去，暂署协办内閣并尚书，令在尚书任赎罪。而张廷玉今日回奏，并不涉汪由敦一字，岂伊保奏汪由敦而即忘之乎？张廷玉既以衰老致仕，朕何难曲示包容？而正不然，伊等有此隐伏情形，若不明白宣示，则伊等不知朕保全之深恩，而直谓朕堕诸臣术中而不觉，传之史册，知者谓朕委曲包涵，不知者谓朕为何如主？朕甘受此耶？即有议其刻核，亦所不避。用颁谕旨，令中外知之，仍令张廷玉一一明白回奏。”（《乾隆起居注》第八册，三九七下）

乾隆皇帝，第一是怪他一心辞归，对朝廷毫无眷恋之情。其次是，予告既以得成，又请身后配享之事，有过于计较个人荣利之嫌。而且，既经承诺配享，如此旷世殊荣，张廷玉竟不亲自前往谢恩，显然有失敬重，也违背了人臣之情。这令乾隆皇帝非常恼火。事实上，平时，张廷玉做事相当谨慎，对于皇上些微的赏赐都会亲自前往谢恩，但这次，受到这么重大的赏赐，按其一贯的风格来说，肯定要亲自谢恩，但结果竟然没有亲自谢恩，这确实让人不解。后来张廷玉的奏折，和张若澄的记载，基本也是含糊其辞，看不出什么门道来，只能说，张廷玉处理得确实有些不妥，虽身体欠佳确是一方面原因，但还是不能作为他不亲自谢恩的充足理由，也难怪乾隆皇帝要大发雷霆，旧账新账一把算了。

谕云：“夫配享乃皇考遗诏，朕何忍违？观其汲汲面请，惟恐不得之意，直由信朕不及故耳！张廷玉事朕十有四年，朕待群臣事事推心置腹，而伊转不能信，忍为要挟之求，观其如此居心，其有不得罪于天地鬼神者耶？且配享大典，千秋万世，自有公论，得所当得。则为歿世之荣，苟其过分叨恩，徒足供人指摘，何荣之有？试思太庙配享，皆佐命元勋，张廷玉有何功绩勋猷，而与之比肩乎？鄂尔泰尚有经度苗疆成绩，而张廷玉所长，不过勤慎自将，传写谕旨，朕诗所谓两朝纶阁谨无过耳。而颯然滥膺俎豆，设令冥冥有知，当蹶蹶惶悚，而不能一日安矣。此在朕平心论之，张廷玉实不当配享，其配享实为过分，而竟不自度量，以此冒昧自请，有是理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岂有辗转思维，惟知自私自利？不惟得之生前，而且欲得之身后，不亦昧于大义矣乎？但如大学士九卿所议：不准配享，革去大学士勤宣伯，令其在京待罪。”

这次，乾隆皇帝不仅不满张廷玉不忘名利，甚至对他一生功绩进行了否定，认为他不